

181-196

## 目 次

壹、概論.....	183
貳、從「傳統政治」走向「民主政治」—中國政治的現代化.....	184
一、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變革.....	184
二、如何走向民主政治.....	185
參、從當前大陸情勢看中國大陸民主化前途.....	186
一、十年來（一九七八—一九八八）大陸社會民主化思潮的發展.....	186
二、中國大陸的大勢所趨—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186
三、十年改革的悲劇結局與中國民主化的展望.....	187
肆、綜論當前的兩岸關係.....	187
一、學習交往、溝通和相處.....	187
二、如何減少誤解、降低誤判.....	188
三、經濟力量的工具面.....	189
四、台灣經驗與統一.....	190
伍、統一中國三部曲.....	192
一、以文化統一為基礎.....	192
二、以經濟統一為手段.....	192
三、以政治統一為目標.....	193
陸、結論.....	193
柒、參考書目.....	194



# 民主統一中國之研究

張得興

## 壹、概論

在一百多年前，鴉片戰爭後，古老的中國在歐美風雨吹襲激動之下，開始步入西方文化的塗轍，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所以有一些人一談到民主，總以為它是西方近代的東西。如果是稍具西洋歷史知識的人，知道歐洲古代希臘、羅馬已有了民主政治，他們同時又承認民主也是西方古代的東西。這就是說，無論近代民主或古代民主，都屬於西方的、外國的；好像中國不僅近代沒有產生過民主，即使古代也沒有產生過似的。

其實不然，任何民族，皆有原始民主制度。正如任何民族，皆有其原始共產社會一樣。西方有其希臘、羅馬的古代民主，中國亦有其古代的傳統民主。人類文化在基本上是相同的，但由於地理環境、人種特性、歷史傳統、風俗習慣等之不同，形成各民族不同的文化體系，因而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而屬於政治思想或制度的一個類型的民主，當然亦有古今中外之不同，但此不同係就形態上特殊性而言，若從其本質上看，無分東西，無分古今，民主跟文化一樣，也有它的共通精神和一般涵義。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在中國是古已有之的；一人民是國家的主體。此在「民為邦本」之說中，已肯定了。二國事必以民意為歸。此在「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之說中，已肯定了。三人皆有人格尊嚴。此在「堯舜與人同」，「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中，已肯定了。中國過去有民主思想的傳統，而且有若干民主性的制度之成就，雖然較之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水準，還差的很遠，然而民主主義畢竟在中國有根。所以在近代中國為近代西方的強權所擊敗後，特別是被摹仿西方而成功的日本所擊敗後，中國的反應，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是日益有意識的民主主義運動。因為中國人知道，近代西方民主制度，乃是將中國古代民主思想提高到現代水準的東西。這一制度，可以保持中國的團結，並解放中國人的能力，如是中國民族主義才能成為一種有效的實在。因此中國民族運動，同時也是一民主運動，這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孫中山以至五四時代許多思想可以證明的。而且，也是維新運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護法戰爭，以及北伐以來，中國實際制憲，行憲的歷史可以證明的，今日中國的憲法，就是這長期運動的最後產物。

然而正由於中國民族運動與民主運動之不可分離性，他也便遇到內外的敵人；日本

帝國主義者和軍閥，蘇俄帝國主義者和中共。尤其是蘇俄支持的中共，一面假「新民主」的口號，在中國勝利以後極力破壞中國憲政之實施。破壞中國民主制度之實現。中共叛亂一時之成功，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大挫折。

## 貳、從「傳統政治」走向「民主政治」

### 一 中國政治的現代化

中國傳統政治的週期性「振興」和「衰敗」同中國傳統的四項特徵密不可分：第一、存在一個集中在個人手中的、不可分割、不可轉讓的最高權力；第二、存在一個單一化的、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人們缺乏「縱向分權」的意識；第三、行政權力的範圍不受限制，可以干預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全能主義」的權力觀念在人們意識中根深蒂固；第四、權力的行使和更迭缺乏程序。即使中國農民起義推翻了舊的王朝，建立起來的却仍是一個新的王朝，中國傳統政治的四項特徵始終存在。

### 一、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變革

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有四個重大歷史事件或歷史事實，就是辛亥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文化大革命和海峽兩岸的對峙。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王朝的統治，使共和主義在中國大地上傳播開來。但是，袁世凱重建帝制的努力敲響了共和主義的喪鐘，接著傳統的軍閥政治又在中國重新出現，北伐的統一不能消除中國傳統的四大特徵。

「文化大革命」是當代中國「非程序政治」的集中表現。中共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就是在憲法規定的「政府」以上還有一個掌握重大決策權的「政府」，而事實上，這種權力最後仍集中到一個人手中，中共政權長期以來是圍繞保持、鞏固這一最高權力而展開的，這一最高權力是建立在掌握這一權力的個人在意識形態上的正確性的基礎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黨內走資派」、「反擊右傾翻案風」根本談不上什麼「反對錯誤路線」，而是圍繞著維護集中在個人手中的最高權力而必然形成的鬥爭。文化大革命的宗教狂熱中，人都易於接受「革命接班人」的思想，林彪、王洪文這些「接班人」是「預立儲君」的「非程序政治」，所以，只要國家存在一個集中在個人不容分割、轉讓的最高權力，政治必然是「非程序政治」。

當代中共，長期以來，「全能主義」的權力觀念仍在，當政機構的權力仍然可以隨意干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僅黨政領導人認為，他對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單

位的各種問題都有決定權，而人民亦希望領導人親自過問並解決本來應由這地區、部門、單位解決的問題。所以，今天中共的政治仍存在大量「非程序政治」的因素。

## 二如何走向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一種程式政治。在一個目標、意見、價值觀有分歧的團體或人群中，實行民主，就是按團體成員認可的預定程序來做出或修改團體決策的過程。民主不能保證決策絕對正確，但民主能保證錯誤的決策按預定的程序得到修正。當團體中的多數人在實際生活中認識到原來的決定是錯誤的時候，原來的少數就可以變為多數，這樣通過預定的程序就可以使錯誤得到修正。實行民主，如果決策者不稱職，可以通過預定程序來撤換。如果沒有民主，人民就沒有按預定程序來撤換的權力。在中國傳統政治下，由於集中在個人手中的權力不可分割和不可轉讓，重大政策轉變或錯誤的修正必須借助於非程序的方式才能實現。在中國傳統政治下，人們普遍認為，政治的好壞，國家的興衰，同政治體制沒有多大關係，而同掌握各級權力的領導人，特別是事實上掌握最高權力的領導人的好壞有密切關係。所以走向程式政治，首先要從理論上、思想上破除中國傳統政治的「人治」觀念，而確立「用制度來約束人」的觀念。

執政黨是組織政府的黨。執政黨在組織政府時，可以吸收其他政黨和非政黨人士參加政府。任何一個政黨，它都有權對全國性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方針、政策。在一個「法治」社會中，執政黨可以通過憲法和法律規定的途徑，把黨的決定轉變為國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在當代中國，建立民主政治，首先要在執政黨內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民主機制，使黨的核心領導機構的權力更迭建立在預定程序的基礎上。

黨政分開是走向程序政治，使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重要關鍵。黨政分開的實質，不僅在於黨政職能分開，而在於確立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使國家最高權力的產生、行使、更迭完全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使「人治」變為「法治」。黨不是國家機關，黨的機構同國家機關、公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之間，沒有組織的上下級隸屬關係。在全國、在一個地區，只有國家政權機關才能以全社會公認代表者的身份來處理全國或一個地區的日常公共事務。黨的機構不能代替國家機構行使權力。所以，只有嚴格實行黨政分開，才有可能使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分別由不同的國家機關而不是黨的機構來行使，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改變傳統中國權力高度集中於個人手中的現象，也才有可能使權力的行使和更迭能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

中國政治的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既是建立「民主政治」的過程，也是使中國從一個「人治」國家轉變為「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國將遵循著最適合中國本身的途

徑從「傳統政治」走向「民主政治」。

### 叁、從當前大陸情勢看中國大陸民主化前途

#### 一、十年來（一九七八～一九八八）大陸社會民主化思潮的發展

一九七八年是具有劃時代意義和決定性意義的一年。五月十一日在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它推倒了「兩個凡是」，並成為鄧派開展全面改革的「經典」理論依據。但是其副作用，即是承認馬列主義也有錯誤，也會過時，並非「普通真理」，這個副作用直接加速了馬列毛「偶像理論」的崩潰，成為民主主義思潮在大陸社會重新出現的重要催生劑。

由於中共具有反科學、反文化、反知識和知識份子的反智主義傳統，大陸知識份子一旦解脫了馬列主義的思想束縛而獲得理性自覺，必然就會成為一股反專制、爭民主的巨大力量。十年來中共對大陸社會民主思潮的流行，發動過三次全面性的暴力鎮壓；第一次是一九七九年鎮壓「北京之春」運動，第二次是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第三次是一九八七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表面上看，這三次鎮壓都是成功。實際則大為不然。每一次鎮壓只是迫使民主思潮暫時收斂，轉為潛滋暗長而傳播得更廣更快。

#### 二、中國大陸的大勢所趨——破中山賊易，破心中賊難

唐代晚期外有河北藩鎮之亂，內有朝中朋黨之禍。當時有人說：「破河北賊易，破朝中朋黨難。」後來宋人改此語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意思更深入一層。由於王陽明的引用，這句話便從此流傳天下。

兩年前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中國八十個大城市群起響應的群眾抗議，都已被中共政權定性為「動亂」，也在坦克與機槍的鎮壓之下煙消雲散了。在中共眼中，這些以最溫和，最理性的態度要求最起碼的人權的中國人，其中包括學生、知識份子、市民、工人、還有良知未泯的共產黨員，都是「山中賊」。中國的傳統王朝一向把「山中賊」看作最大威脅，這很容易理解，因為王朝建立者都是「山中賊」出身。「成王敗寇」的鐵則使得「王」最怕「賊」。中共正是傳統王朝的現代變相，當年也是靠煽動學生和群眾為它打下天下的。今天忽然看到學生和群眾竟衝著自己而來，其緊張自可想而知。中共用最新式的現代武裝力量在一夜之間便消滅了各地的「動亂」，似乎再次證明了「滅山中

賊易」的道理。但問題在於「心中賊」卻反而因此更大為滋長了。

### 三十年改革的悲劇結局與中國民主化的發展

在歷經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之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中共「人民解放軍」的坦克車終於開進天安門廣場，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市民。這個悲劇不僅結束了為期五十天的民主運動，也結束了為期十年又五個月的改革路線。對照匈牙利民主化的進展，我們不能不為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頓挫感到痛心。為什麼在中國大陸會有這樣的悲劇結局呢？首先我們想到的是中共黨內的保守官僚勢力仍然龐大，使得傾向改革的人在黨內成了少數，而鄧小平的機會主義使他雖然願意進行經濟改革，卻不願意進行以民主化為目標的政治改革，以至當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之後，鄧小平寧可捨改革而就保守。中共黨內的改革派要角，如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啓立等，都是鄧小平提拔起來的人，他們不可能、也不願意去公然反對鄧小平。當民主運動興起，鄧小平受到保守元老的包圍，鄧小平只能以犧牲改革派健將的方式來保全他自己。

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是否就真是沒有希望了呢？應該還不致於這麼悲觀。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存在著一個獨特的條件，就是在中國大陸之外存在著一個屬於中國的政治實體，而這個政治實體正在勇敢地邁向民主化。這個政治實體就是中華民國台灣，台灣正以其耀眼的經濟成就對中國大陸形成示範作用，台灣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努力也當可對中國大陸形成示範作用來影響中國大陸，並不足以改善中國大陸的政治體質。當中國大陸陷入「政治—經濟」間的惡性循環的時候，需要有外來的力量來突破惡性循環，也就是說，中國大陸需要「外促」的政治改革。台灣可以擔任這個「外促」的角色。

台灣之所以足以擔任這個角色，是由於中共政權始終以「統一祖國」為職志，中共對台灣的各項政策，無不圍繞著統一來設計，對台灣人民來說，統一的前提應是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假設中共允諾台灣宣佈獨立，台灣的民主化就像其他國家的民主化一樣，對中共政權可能無法形成「外促」的力量。可是由於中共不可能允許台灣獨立，台灣宣佈獨立將招致立即而明顯的危機。於是對於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台灣人民，就無可選擇地必須以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為職志。

### 肆、綜論當前的兩岸關係

#### 一、學習交往、溝通和相處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日的紐約時報的社論直稱「台灣大到不能忽視」代表國際輿情，也說明了既存的事實。這項事實是台灣多年來努力的結果，北平無法否認。在人類的政治史上，否認或拒絕一項事實是容易的事，但要承認現實往往需要前瞻的視野和寬大的胸襟。大陸與台灣的面積及人口相差如此之大，理當由大陸表現包容和接納的胸襟，讓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一起邁向統一。當前最重要的是邁向統一的過程必須是和平、漸進和互惠的。有些學者把它稱之為學習的過程，確是很切題的描述。分隔四十年之後，兩岸人民需要調整自己的看法，學習和對方交往、溝通和相處。就此而言，台灣四十年以來的政治社會化過程有它積極的一面。不論文化和認同，或是歷史觀和世界觀，台灣地區的人民經歷了一個「中國化」的社會過程。文化的共屬感表現在宗教信仰、人民情感和共同語言各方面，特別是解嚴之後的福建與台灣兩地信徒同為媽祖建廟即是一例。但是文化的共屬感卻無法超越政治的限制和意識形態的阻隔，其中特別是對於彼此政治體制的缺乏充分了解，以致於過高的期望和主觀的看法為兩岸關係製造了不必要的誤解。

## 二 如何減少誤解，降低誤判

本來不同社會體制之間的人民交往或菁英溝通就需要較長的時間。台灣兩岸長期的敵對，要降低緊張和減少誤解，只有在大、小環境著手。大環境的改變已經出現在國際體系，兩岸之間的政治互相接納則尚未出現。由民間的接觸影響政策的制定只有在開放的社會才能達到效果。這就說明了台灣民衆走在政府前面，政策隨著改變的社會形態。相反的，大陸的民衆對於台灣的敵意可能已經降低，但中共政權的態度沒有受到民衆的影響。在雙方沒有達到互相尊重、和平共處之前，這種交往的形態及其結果對於台灣的壓力和衝擊遠超過大陸。台灣基於安全的考慮，限制大陸來台的人數確有其必要。有人認為既然要散佈台灣經驗，又限制大陸人民進入台灣，何以能宣揚經驗？這裡的限制是在維護現有的體制，避免因為過度負擔而產生失衡的現象，這也是台灣與大陸面積及人口相差懸殊造成的結果。

短期之內，台灣社會面對民衆要求改變的壓力，在治安和秩序方面，也有暫時惡化的現象。一般稱之為大陸熱的負面作用。可是，多元和自主性高的社會必定有自發性的力量逐漸免除上述的衝擊。政府的監督以及必要的懲治措施也是不能缺少的。台灣在經過了調適期之後，成熟與有信心的民衆自然會對大陸造成理性與和平的影響力，再度要強調的是，這種影響力表現在過程，至於結果則要留待以後兩岸的中國人去決定。

因此，安全的顧慮與政治的警惕是發展現階段兩岸關係的必要條件，它們並非是預設的條件，而是兩岸制度不同造成的結果。等到制度趨於一致，這些條件就不需要了。

以德國的經驗來看，西德在促進民衆了解東德的過程中，對於安全的關切均無鬆懈。即使德國統一之後，有關的規章還是繼續使用，東德的公務人員或共產黨員只有遵照這些規定辦理退休、轉業或接受新的教育及專業訓練。

至於談判則是言之過早。任何談判的理論家很容易可以舉出理由，說明台北不必，也不能在此時和北平談判。且談判的目的不清楚是原因之一。談判不能促進了解是原因之二。開放的社會與封閉和集權的社會談判往往對內部的壓力，一旦談判開始，必然有不同的意見，製造內部的分裂。尤其是當談判的問題與內政密不可分之時，每位公民都受到談判結果的影響，能有不關心之理？高度的關切轉變成的壓力使得談判代表忙於內政，無暇對外談判。更不利的情形是，封閉的社會在此時處於暗處，開放社會處於明處，前者很清楚的看出來後者的籌碼、意志和弱點。政治談判本來就是國家方略的一種，戰爭達不到目的的事只有用政治的方法，談判就此而言，其實就是戰爭的延續。不論是勇將或謀士，他們均明白時機不對的戰爭應當避免。以此來觀察當前的兩岸有關談判的說詞，很容易可以明白它是不切實際的。

然而，非政治性的接觸或功能性的交往卻有助於整合，這在歐洲已經充分證明。即使在不同制度的社會之間，意見的溝通和功能性的互動關係，都會產生「後溢」的效果，改變原有的猜疑與不信任感。這種逐漸累積的信任感正好是「獨」與「統」之間的緩衝地帶。這個地帶愈大，平衡的情勢愈能維持下去，統一的基礎就愈堅實。兩岸目前都說沒有統一的時間表，多少以表現出良性的互相認知和期望。但是單憑心理上的因素並不能凝聚相互的信任感。長期以來，「獨立」是破壞兩岸關係的最大負面因素，中共可能激烈反應及台灣可能遭受的損害，已經是耳熟能詳的事。可是，最近三年的大陸熱及大陸對台政策指出另外一種趨勢；立即或過分急躁的鼓吹統一也是不安定的因素。台灣之擔憂大陸熱，海峽對岸關心「和平轉變」，道理在此。更簡明的說，大陸對統一的急迫感和台灣內部的獨立訴求，都是破壞性因素。個人以為大陸不宜使用簡單的三分法，分析台灣內部的意見光譜，這樣的作法只有過分簡化一個新興工業化社會的複雜性，進而無法了解它的變化脈絡。台灣又何嘗不需要以更客觀及深入的科學態度，去探討大陸最近的轉變？這些說起來很容易，作起來頗有阻力的「信心建立」過程是談判不能缺少的條件。

### 三 經濟力量的工具面

使用經濟力量改變共產社會早在六〇年代就有人提出來，主要是針對蘇聯與東歐。和解時期的美蘇關係和歐洲情勢都含有這些因素。現在回顧歷史，如果沒有當時的經濟

開路，今天歐洲的政治變化恐怕不會如此之快。關於這個問題，政界和學界還是有不同的意見，贊成的人認為經濟本身就是改變的力量，風險較小，自由社會不必自我設限。反對的人認為經濟的利益到最後還是會轉變成為國家力量，以經濟援助或貸款提供給敵意未消的國家，應當儘量審慎。面對二種不同的主張，西方國家有不同的指標，界定本身的政策方向及具體作法。有時比較保守，有時卻傾向開放。這些指標不外乎是：(1)本國的政治目標；(2)經濟需要；(3)經濟工具；(4)對方可以被影響的程度等。更簡單的說，就是政治的風險和經濟的代價。理想的情況是低風險和低成本，但通常無法達到這樣的境界。

如果不用美蘇關係作為例子，德國的關稅聯盟完成統一或歐洲的經濟整合也有不同的經濟，可是台灣本身客觀的條件不同，無法參照他們的經驗行事。德國馬克在統一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新台幣在短期之內恐怕沒有這種力量。韓幣同樣不能達到德國馬克發揮的政治統合力量。這樣的說法為的是能更務實與客觀的了解兩岸之間人文條件和經濟結論上的差異，避免過於一廂情願的幻想。台灣本身市場有限，要想使用金融的力量主導兩岸的統合確實不易。我們查考歷史，也沒發現這種例子，比方說英國與歐陸一直就不合諧，薩丁尼亞是依憑民族意識和軍事力量完成義大利半島的統一。

上述的說法在於分析台灣與大陸客觀條件懸殊造成的特殊環境，及對於經濟工具的限制。面對一個政治控制嚴密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無法區分，政治需要謹慎，經濟活動亦要有相同的顧慮。就此而言，台灣再次面臨決策的困境。這種困境是因為不管理不行，但要管理，卻又很難有效執行。要減少可能的負面作用只有周延的立法，配合業者的自我約束。為了整體的利益，間隔的對大陸投資也應當有系統的規劃、追蹤及評估。快速的資金外流等於是投機的商業活動，對台灣與大陸都沒有好處。加上投資的事業又是屬於回收快和低成本的项目，實在沒有社會或政治的轉變效果可言。十九世紀的英國盛極一時，最後走上衰亡一途，過多的海外投資是原因之一。二十世紀的美國喪失海外競爭功，同樣也有人怪罪海外投資。即使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來看，過多的外來資金對於社會體系的穩定並無好處。新馬克思主義者攻擊北美地區的跨國公司，批評西方經濟體系對於開發中國家的控制。中國大陸在短期內吸收太多的外來資金同樣會遭遇到這些弊端。總結來說，溫和以及漸進的兩岸經貿關係是達到互利和互補的先決條件，台灣在提供資金之餘，一定要提昇工業水準，設法以技術的優勢維護本身的討價還價籌碼。否則，面對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及大陸的競爭，單憑金融服務，恐怕無法維持優勢地位。

#### 四 台灣經驗與統一

一般以為台灣經驗只有經濟的內涵，這個看法忽略了社會與政治發展的意義。從民國三十八年開始，政府與人民發揮的勤儉、刻苦與開創力量，確實是歷史上少見的個案。以少數的幾個海島與大陸相抗衡，早期得利於美援，以後則依靠本身的意志及力量，確實相當不易。華僑暫時不計算在內，二千萬人口面對十二億人口，這項競賽由零和轉變為非零和，關係由對立轉為互惠，確是中國人之福。在可見的將來，台灣不可能不注意大陸的發展，地理、人文以及政治的紐帶關係如此密切，絕非一紙聲明或少數人的意見可以改變的。台灣的生存依靠國防力量、外貿與靈活的外交，更重要的是穩定的兩岸關係。

兩岸的關係無法鎖定於當前的現狀，它本身是不斷在演進的，反應出大陸、台灣以及國際的情勢。我們常說潮流是抵擋不住的，大陸面對蘇聯及東歐的改革，執政者應當有所了解。台灣面對高度消費社會產生的問題，同樣是國際潮流的力量造成的。有人到了大陸之後，表示當地的情況就像是二十年前的台灣。這不就是歷史的潮流和發展的不同階段造成的結果？情勢的演變在我們控制之外，但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卻是在兩岸政府掌握之中，一項最務實的態度就是把兩岸關係界定在下列基礎上：使用可行的方法，利用有效的機制去達成可能的目標。換句話說，不可能達成的目標暫時擱置，過於理想化的意見同樣不予採行，僅使用普遍認為可行的方法，分階段進行。

兩岸關係在將來是既交流又競爭；要互相影響，又要自我約束的局面。這種特性說明了機制的必要性和溝通管道的現實面。未來的中介團體將扮演中間的角色，而最近成立的國統會、陸委會及海基會也是分工清楚的組織。台北對大陸的政策可望在這三階層的決策體系之下，走向更明朗的方向和跨出更穩健的步伐。如果兩岸關係能描繪成一座階梯，雙方正從最下層的交流逐漸往上登。如此發展的最後結果是中國人追求的統一目標。在不同的階段，雙方若能逐步的達成文化認同、經濟互補、安全無礙、互相尊重及政治民主，何時統一已不是問題。

誠如以上所言，兩岸關係不可能是靜止的。我們很難用機械式的安排處理這種不斷演變的關係，只要審慎的維護努力的成果，然後塑造更穩定的環境。兩岸的最關鍵問題不在於生活水準的差異，而是民主化和自由化是否能在大陸和台灣持續發展。它無疑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因為新的生活方式、行為規範以及價值標準，一直到制度的建立，總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大陸和台灣正在轉變，也不斷的互相調適，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有良性的互動關係。在這項近代中國歷史最偉大的政治工程之中，大陸要比台灣負擔更重的責任，付出更多的努力，表現更大的耐力，因為我們不僅要統一，而且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與均富的新中國。

## 伍、統一中國三部曲

統一的中國，是全中國人一致的希望。而以大陸現狀觀察，「統一」只是雙方共具之遠程目標，短期內勢必無法實現。在此前提下，只能在理性基礎上，考量雙方立場，採取逐步漸近手段，達成統一最後目標。

### 一、以文化統一為基礎

文化是歷史生活經驗的結晶，透過社會化的過程，代代相傳，故必然有其持久性，而台灣與大陸所共具珍貴資產—中國文化，實為統一之寶貴基礎。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兼容並蓄之精神，即使中共於文革期間大肆摧殘中國傳統固有文化，亦難去其深厚根基於萬一，反造成大陸今日對傳統固有文化之補償心理，形成現今大陸孔學、孟學之蓬勃發展。而同為中國人之強烈認同感，更為兩岸文化交流之最大動力。自我探親政策開放以來，藉由人民之直接接觸，進而帶動渴望尋根之要求，形成文化交流之熱潮。故台灣可透過兩岸文化熱烈交流之當口，經由民間管道，致力於政治文化之整合，使大陸政權漸趨理性化、現代化、自由化與民主化。如此，藉由中國傳統文化之整合，將有助於兩岸政治對立之消弭，從而增進彼此認同，為日後統一奠定良好的基礎。

### 二、以經濟統一為手段

「六四」事件之後，基本上，大陸民衆對中共政權抱持排斥而又不得不容忍接受之態度。而中共政策亦首重安定原則，在安定的基礎上，推動經濟改革，以補屠城事件所帶來之慘重後遺代價。而事實上，「六四」之後中共之緊縮政策已造成債務劇增、幣值下跌困境。中共「總理」李鵬在「七屆人大三次會議」所公佈之「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明白招認此一逆境，表明政局之動盪，使中共不得不大幅改革。而針對中共當前情勢，擴大兩岸經貿交流，對我將更為有利。以往我政府對兩岸經貿交流慮及中共會藉機向我採政治勒索手段，而抱持審慎態度。此一顧慮，雖屬必要，但卻不可因之而退卻，反造成前文所述之弊端。如前所述，只要我制定完善之大陸政策，則相對的，我亦可透過經濟交流箝制中共，一如東歐之接受外援而引發政治之重大變革。平實而論，以中共現階段之困局，兩岸經貿交流，我方占有極大優勢。基此前提，我當運用雄厚之經濟實力，統籌規劃，掌握先機，主動出擊，發揮對大陸政治之影響，自然有利最終目標之實現。否則任由民間如同散沙般盲目投資，極易掉入中共預設陷阱，後果將不堪設想。

### 三、以政治統一為目標

：「台海兩岸經四十年長期對峙，互相仇視與不信任之情結，非短期內可消弭，再以彼此社會、經濟、乃至政治體制等差異析論，目前論及政治統一，非但敏感，而且不宜。故宜暫時透過文化、學術等民間交流方式，並輔以經濟交流，以文化交流為基礎，經濟交流為手段之漸近方式，使中共逐步走向民主自由之途，最後達到政治統一之目標。而只要中共持續進行經濟改革，不可避免的要帶動政治改革，二者是齊頭並進，缺一不可的。絕非如鄧小平所預設「經濟向右、政治向左」之預想模式，此點，由「六四事件」之慘痛教訓可明顯印證。而就整個國際大氣候與其國內小氣候觀察，中共改革已勢在必行，無法退卻，而只要中共持續改革，大勢所趨，終將使中共棄守「四個堅持」。前行政院長李煥更明白指出，「惟有中共放棄四個堅持」，統一中國才有希望，三民主義建設台灣之卓越成就必將是中國統一之藍圖。可預見的中國前景終將是光明的。」

統一之變數瞬息萬變，不易掌握，上述之模式未必能完整勾勒清晰輪廓，僅管過程曲折，但最終仍將達成統一之神聖目標，而只要以理性、和平之手段，輔以兩岸共同努力化解僵局，則統一指日可待。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於成立之初所揭櫫之綱領，適足勾勒中國統一後之遠景：

1. 統一的中國，應為一真正獨立的中國。
2. 統一的中國，應為一真正民主的中國。
3. 統一的中國，應為一真正自由的中國。
4. 統一的中國，應為一真正均富的中國。

## 陸、結論

：我們應如何努力追尋國家統一的目標，分述如下：

1. 創造成熟條件：四十多年來，我們的一切努力，雖然著眼於復興基地兩千萬同胞的安全與福祉，但也從未放棄對整個中國所應負的責任。全體中國人對自由、民主、均富的嚮往，必將成為主導未來國家統一的最大力量。當此國際社會正由對立謀求和解的時刻，我們必須把握此一契機，克服一切橫逆，盡其最大努力，使大陸的十一億同胞一致認定民主、自由、均富是中國統一的最佳目標，這就是中國統一的成熟條件。
2. 推進互斬關係：以國家統一為前提，推進海峽兩岸良性互動關係，並以完成兩岸

關係條例，作為互動的規範和基礎，以表示我以自由、民主、均富統一國家的誠意，至於進展程度如何？當然要看中共有無善意的回應。實在說，中國的統一，絕不是誰統一誰的問題，而是「一國良制」的問題。統一也者，唯良制能統一；唯有良制統一劣制，才是中國長治久安之道。所以我們應積極將「台灣經驗」，加速推上大陸，深信必能很快就立竿見影，水到渠成。

3. 絕對支持政府：「國家統一綱領」草案的提出，充分展現了政府促進國家統一的意志與決心，在海峽兩岸絕大多數人民共同追求和平統一的前提下，無疑是深具時代和歷史意義的。因此，我們必須絕對支持政府，樂觀其成。

4. 平息統獨爭議：台灣地區內部有關統獨爭議，應當及早平息。因為少數主張「台獨」人士的動作越大越頻繁，中共的強制性格在統一策略上也將越強烈。如此一來，無論在時間上或空間上都將不利於我們。因此，我們希望那些少數人士，能夠「立足台灣，放眼大陸，心懷全中國」，摒棄私念，廓然大公，為國家共謀統一大業。

「國家統一綱領」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地區經過四十多年的勵精圖治後，對國家統一問題，所提出的一項最具信心，也最具前瞻性的宣示。政府依據此一綱領所宣示的原則，將視未來情勢的發展，循「近程—交流互惠」，「中程—互信合作」，「遠程—協商統一」等三個階段，逐步重建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統一的中國。只要中共領導階層放棄其僵硬的馬列主義與極權制度，了解武力並不能解決中國問題，願意以對等的、理性的立場開展兩岸關係，則兩岸的良性互動將會加速進行，中國的統一大業也將指日可待。

## 柒、參考書目

- 一 當代各種主義之比較研究，EBENSTELZN 著，萬德群譯歐工幹報譯印，民53年 3 月初版。
- 二 民主政治新論，任卓宣著，帕米爾書局印行，民69年 7 月初版。
- 三 中國民主思想運動史，周弘燕著，清水商行印刷，民53年 7 月二版。
- 四 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台海兩岸互動之分析，董立文碩士論文，政大，民79年 6 月。
- 五 論海峽兩岸政策與中國前途，國安民，中國大陸研究，民79年 8 月。
- 六 中國大陸經改失敗的政治根源—兼論中共四十年來的政治經濟制度，趙穗生，中國大陸研究，民80年 3 月。

七天安門的省思—民主與反共，蔡國裕，歷史教學，民78年7月號。

八新天安門事件下的台灣省思，莊文瑞，中國論壇，民78年6月號。